

文史資料選編

湖南省文史資料選編

第

二

集



苗底

82.1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益阳市委员会
文史資料工作研究委员会編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12093

存档

目

录

1. 回忆周恩来同志在武汉珞珈山

国民党中央军官训练团讲授

《论持久战》。1400..... 龙叔韬

2. 回忆陶铸同志告诉我过三关900..... 刘旦生、

3. 回忆我弟弟曾三青少年时代5600..... 曾海楼

4. 被巢之下，焉有完卵 —— 回忆

冯玉祥将军在益阳的一次 1400

抗日讲演 奚范章

5. 千里转战到湖南3000..... 仇甬夫

6. 两“卧”记2000..... 张永年

7. 资料两则1400..... 张俊德

8. 解放前后益阳市针灸医疗事业

的发展情况2100..... 刘竟泉

9. 五十年来益阳见闻两则1400..... 龚宽

10. 曾韵珂、周明生遗诗选刊2800..... 姚松泉

11. 裴公亭会龙山著名对联集锦1600..... 编者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共11篇 字数25600

周恩来同志在珞珈山国民党
中央军官集训团讲授《论持久战》的情况回忆

龙 叔 韬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以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在华东主力战场方面，上海、南京相继失陷。到1938年5月，日寇沿长江两岸步步深入，企图攻取武汉，当时国民党政府为了整顿部队，鼓励士气，于1938年七月，在武汉珞珈山，设中央军官训练团，召集华东、华南国民党部队团级军官受训，计划重新调整战略战术，为下一步作战作好准备，我从浙江新登前线调来参加受训，计划时间安排一个月。

武汉的七月，天气格外闷热。虽然东湖比较凉爽，但武汉旧式简陋的建筑，显得有些拥挤，那里的学校早已停办，我们就在体育场搭起临时讲台，各人带小凳子，露天坐地听课，一切都很简单艰苦。训练团团长万耀煌是保定军校的一位军官。他对训练也拿不出什么计划，每天只是安排学员搞小组讨论，大家只是把前段作战经验教训，作作总结，对上面指挥缺点发发牢骚而已，当时国民党由于形势紧张，来不及多派人抓训练工作，因此学员没精打采，搞不出什么名堂。

当时周恩来副主席适在武汉工作，万耀煌就邀请他来团演讲，一天大家兴奋地集合在体育场等候。万团长带领干部到校外欢迎，随即陪同周副主席来到体育场。大家热烈鼓掌欢迎。周副主席身着灰色中山服，头戴小型草帽，神采奕奕，走上讲台后，把草帽放在桌上，向学员一再鼓掌致意。学员们又是一阵掌声之后，演讲开始了，学员们全神灌注地静听，周副主席表情严肃而又和蔼，显出一种乐观愉快的

心情，略带苏北口音，开始讲授《论持久战》。

他首先介绍了《论持久战》是毛主席集中全党智慧对抗战提出的总的战略方针，提出了战争必然要经“战略退却、战略相持、战略反攻”的三个阶段，得出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光辉论点。他从战争性质、敌我双方力量、地理条件、国际国内形势等方面阐述这一论点的无比正确，说得我们学员都精神焕发，勇气倍增，那种没精打采的情绪一时烟消云散了。在批判各种错误思想时，周副主席说：目前有人对抗战存在两种错误思想，一是盲目乐观，认为日本是小国，经不得打，平型关和台儿庄两仗不是就把它打得昏头转向吗？一是消极悲观，认为日本工业发达；我国是小农生产，打它不赢，只能做它的附庸，这两种思想是我们抗战的最大阻力，我们要坚决彻底肃清这种错误思想。周副主席深入浅出的举了很多例证，详尽阐述了中国抗战的特殊意义。科学地分析了战争的发展规律，把上述两种错误思想驳斥得体无完肤。当时，我一边听，一边就在默作自我批评。周副主席最后说：几十年来，列强侵略中国，日本是最危险的敌人，它从甲午战争起，就侵犯我国的领土和主权，他得寸进尺，这次又乘机进犯，妄想称霸世界。目前我国半壁大好河山，已沦敌手，日寇所到之处，大肆屠杀中国人民，比希特勒屠杀犹太人，还要厉害，这次抗战是关系到我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我们一定要把日寇赶出去，收复我们的神圣领土和主权，这一光荣伟大而艰巨的责任就落在我们的肩上，同志们都是抗日的骨干和中坚，奋勇前进吧！抗战的最后胜利，祖国的光明前途，正在等着我们去争取，……

周副主席话音刚落，大家肃然起立，热烈鼓掌，大有气撼山岳，盛况空前之慨。从那次讲演以后，学员精神振奋，对抗战胜利前途，充满了信心和决心，顺利地完成了训练任务，愉快地重返前线。

时间过去四十四年了，现在回忆那次精辟的讲话、周总理的光辉形象和谆谆教诲，如在目前，至今感到亲切和幸福。

回忆陶铸同志告诉我过三关

刘旦生

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我随陈明仁将军于长沙起义后，部队开到浏阳县整训，等待改编。十一月初，四野政治部主任陶铸，来浏阳视察部队。我随陈明仁到城外公路边排队迎接。

陶铸首长，乘小汽车来了，下车见了我们，一一握手问好后，步行进城。

第二天，首长，对我们进行个别谈话。我到他住屋客厅谒见。陶铸同志对我和霭亲善的说：请坐，随便谈谈。他问我的家庭情况及工作情况，我一一回答。他笑容的对我说，你要好好的过三个关，这三关，是不容易过的。

一、是过战争关

战争关你们过来了。在长沙起义，是漂亮的穿了鞋袜过河，这是很好，对国家，对人民是有贡献。我们共产党是欢迎的。只要是忠心诚意拥护共产党，跟共产党走，是铁饭碗。党的政策，对起义成员，对过去的事，既往不究。

二、是过土改关

土改关，是阶级斗争关。你的家庭，是剥削家庭，不久要进行土地改革，农民起来打倒地主，摧毁反动的封建制度，是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你已到解放军这边来了，要努力学习，认清形势，与家庭划分界线，抛弃封建家庭立场，站到无产阶级这边来，只有这样，农民会原谅的，才会顺利的走过土改关。

三、是过社会主义关

过社会主义关，这个关，时间又长，又阔广，人人都要过这个关。你们必须加强学习，要改造自己的思想。思想改造，就是过社会主义关，这是主要问题。你现在是体会不到社会主义的意义。希望你好好学习，好好工作，自然会体会社会主义是什么，怎样为人民服务。我不能久讲，时间关系，再见。我即起身敬礼走出。

陶铸同志，是我们的高级首长，他在百忙中热情关心教导我，我十分感动，我当时觉悟不高，形势认不清，在土地改革时，我听了他的教导，与封建家庭划分界线，我得以平安的过了土改关。

过社会主义关的中途，被林彪和四人帮搞乱，十年浩劫中，我思想混乱，不知如何好。不幸的陶铸老首长，受四人帮的迫害不幸逝世，我回忆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在浏阳，对我的教导忽忽三十三年了，我记忆犹新，音容宛在！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四日

回忆我弟弟曾三的青少年时代

曾 海 楼

政协、统战部领导同志常说我年事高、经历多，“文革”以前又搞过政协文史工作，要我继续写点资料。由于我身体健康状况不佳，除了提供线索，协助组稿并写了一些自我的经历之外，还没有正式动笔。最近组稿的同志对我出了题目，要我写“曾三同志的青少年时代。”我起先认为我弟弟曾三从来不搞个人崇拜，不爱吹捧。这个资料由我来写怕不合适。有些犹豫。可是组稿的同志又说：“曾三同志是革命老前辈，功高德馨，您和他又是亲兄弟。青少年时代都是在益阳渡过的。他那时的学习生活、革命活动，只有您清楚。有些情况，恐怕他自己也不一定记得很全面了。如果把那时的情况，如实记下来，这对引导青少年向老干部学习、为修地方志、修党史积累资料，不是都有好处吗？我一听，言之有理，消除顾虑，写了这篇资料。

我的老家在益阳县新市渡公社、石龙山大队、土地生产队。那里接近山区，山多田少、交通阻塞。人烟稀少。真是穷乡僻壤（当然现在不同了，改变了面貌。）。我和我弟弟曾三都出生在这个地方。他原号海云。曾三这名字，是他在箴言书院读书时改的。他出生于1906年农历六月一日。他比我小两岁。据母亲告诉我，由于胎源不足，他一生下来，身体很瘦弱，走路走得迟，我家由堂屋至禾场有个码头，他六岁了，还不能下那个码头，总是我搀扶他下去。

1914年，他年满八岁，开始发蒙读书，这一年在鹿豹村。竹山坳姚德昂先生那里读书，只读了半年。1915年在洛家河洲李茂生先生那里读了一年，后来又在高冲郑家湾。张云峰先生那里读一年。

由于我们家住山村，周围好几华里没有人家，要走出一里多华里崎岖山路上学。有时天雨，泥泞路滑。他身体又不好，真不知吃了好多苦头。1917年，我们想到阳河村曾俊德先生那里去读书，都没有读成。所以只读了两年半私塾，这一段时间，大概是他学习古典文学的开始。

1917年下半年，我们在现在新市渡公社跳石大队迴龙庵保粹国民学校读了半年书。这所学校是一所新兴的初级小学。按当时的说法，叫洋学堂。教师中有姚维宁还是养成师范班毕业的学生。开设的课程，有国文、算术、修身、还有体育、音乐、图画等技能科。那时学校里没有皮球，我们用棉絮一团、外面包一层布做成球当皮球拍。可见当时学校的简陋，不过从这时起，开始接触了新学。

1918年在新市渡岭口陈树坪某小学读书，1919年上半年在谢林港盛氏作人小学读书。在岭口读书我没有去，后来他告诉我一件事，当时学校里有一种坏气习，大同学欺侮小同学。有同志竟把口沫吐在他的脸上，还不准告诉老师。不过这件事，给他后来思想的发展是有些影响的。

1919年下半年，我和他同时考入益阳城区高小（即乾元宫、汽车路学校），这一期他病了几个月，实际在校读书时间不多。

1920年上半年，我们先后转学到益阳县第二高小（石笋、箴言书院）读一年二期。在这段时间内是他智力开始发展，思想开始进步的发轫时期。

在他读私塾和初小的那段时间，由于年龄小，身体又不好，加以我家地处山村，常与外界隔绝，少见寡闻，民智不开。我家世代都少读书，也无从得到帮助。所以这时他脑筋有些迟顿，并不表现聪明，与一般少年并无不同之处。可是到箴言读书时，不论在学习上和思想

上，都有了进步。我记有两件事可以说明这一点，一是他初入箴言书院时，各科成绩都赶不上，特别数理等科，经过他一段时间的勤学苦练之后，在每次考试中，都是成绩优秀，名列前茅，多次获得老师的奖励与表扬。二是在思想上也不象从前那么胆小怕事，表现自弱了。而且有初步的反抗精神，记得在1921年，学校里闹了一件大事。这年冬天很冷，学生本来都交了烤火费，但学校不顾学生死活，木炭买得很少，有一个大雪天，农民送来了一批木炭，几个年龄大一点的同学拿了几块私藏起来，海云也拿了一块，不料，被教员发现了，他把他们叫到办公室，除责令交回木炭外，还要打手心。由大同学带头，我们拒绝了这次体罚。这个教员狠狠地对他们说：“那你们就等着校长回来办吧！”这时，由他们带头，全班同学一哄而起，包围了教员办公室，提出不得使学生挨冻，不得体罚学生的要求。把那个满脑子封建思想的教员吓得溜到宿舍，关起门来不敢见人了。第二天，全班同学实行罢课，许多同学气得自动回家了。反动校方开除了八个同学，海云大概是第九名吧？我父亲接到校长的信，要他送海云返校，返校后，校长对我父亲胡说八道，逼我父亲打了海云的手心，才留下来。他们这次罢课斗争失败了，但是这次斗争，却震动了全县和教育界，过了寒假，反动校长和教员都被免职了，换来了一批比较“开明”的人。他们表示对前校长的做法不同情，这样才稳住了学生的情绪。

海云于1981年四月二十二日在《湖南日报》上发表他和革命回忆录。《六十年前一件事》他谈到这次罢课斗争的体会说：“这完全是一次自发的英勇的罢课斗争，事后没有人去总结，现在早已被人遗忘了，但是它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经过这次斗争，使我对旧社会的认识进了一步，受到了一次锻炼，我们几位同学以后之所以能

走上革命道路，与这次斗争得到的启迪分不开。”

他从益阳县第二高小毕业后，旋于1922年下期考入长沙长郡中学，那是一所五年毕业的旧制中学。长沙是毛主席早期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播下了革命种子。而长郡中学也是当时省城办得较有名的一所学校。当时那里的教员有不少共产党员和进步的知名人士，如革命先驱者夏曦同志、熊亨翰同志当时就在长郡教书。而且他们都是益阳人。海云在长郡是高才生，深得夏曦、熊亨翰等同志的赏识和器重。海云从他们那里开始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上来了一个飞跃。这时他在学生中开始崭露才华，特别是在益阳同学的同乡会中，显示了他的组织能力，在他领导益阳同乡会时，那时同乡都感到他不到会，会议都开不好，可见那时他在同学中的声望。

当时，在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长沙发生了“六一惨案”。他耳闻目睹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这些血淋淋的事实。因此他决心走上革命的道路。大概在这时候，他已经是共产党员了。努力从事反对帝官封的革命运动。他编辑小报，经常在报上发表文章，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和反动派的残酷统治，以唤醒民众。现在有的人还记得他在“六一惨案”之后，在报上发表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恶，其中有句，是这样说的：“希望人们吃了清凉的六一敬，不要忘记残酷的六一案。”

有一次，长郡中学校长张有晋无理开除了两个学生，于是他在报上反对无理开除学生，并声援罢课，因此他和杨孔万、钟纬剑同时被关押。我闻讯从益阳赶到长沙，由贾荣吉（共产党员，马日事变后，被杀于长沙）领我到监牢内探望了他，他从容自若地安慰我说：“哥哥，不要怕，不要难过，反动派采取高压手段，压制进步学生和进步思想，这是永远压制不住的。……”我见他在牢内还写了《监狱生

活》，可惜这些资料，后来遗失了。事情的发展果如他所说，那次罢课，先由长沙发生，很快影响到湘潭、衡阳等大城市，反动派慌了手脚，不得不把他们释放。

马日事变前，寒暑假回家，也参加一些地方革命工作。1925年冬，他回益阳，住在街上。有一天我从乡下上街来看他，走到门前，只见从他屋里走出一个穿长袍的人，我和他彼此没有打招呼。我一进门，海云就向我介绍说：刚才这位穿长袍的人就是夏曦同志。（又名夏曼伯、夏范伯）。

当时高文华等同志在益阳领导农运工作，计划利用耍花灯的传统节，组织农民宣传革命。准备工作正在进行，大约是农历十二月年底的一天，我又到了海云家里。他拿出一个诉苦歌给我看，并介绍说这是夏曦同志拟的稿。要我改正誊写一下，准备在耍花灯时，以诉苦歌代替淫俗的旧花鼓词来宣传革命。我一看诉苦歌的头一句是：不打鼓，不打锣，听我唱个诉苦歌，接着揭露地主豪绅对农民残酷压迫剥削的罪恶事实，以及农民生活极端困难的情景。我还记得歌词有一句说：

“吃得盐起还很好”。我当时一想：吃得起盐怎么算得很好呢？我把它改成“吃得盐起还算好”。我把改了一个字，告诉海云，他认为这样一字之改，比原来的更符合当时农民的实际生活。

夏曦同志是当时革命的领导者，才华出众，尽人皆知，海云当然不及他，可是他拟的稿，还征求海云的意见，可见他们革命者之间那种谦虚、民主的美德，使我至今不能忘记。

马日事变后，夏曦同志指示要他回家避避风浪。在那些时间，他在家参加一些地方农运工作外，他还抓紧时间，深入实际，学习有关社会风土人情的实际知识，如对各族姓的派语（各姓都有派语，如曾姓的派语是：“兴毓传纪广、昭宪庆繁祥”），还要熟悉一些普通

人的姓名，及其家庭亲属情况。还要学一点生意经。打算盘，写条据等，为什么要学习这些东西呢？据海云说：有两方面的需要，一方面作社会调查，了解社会各阶级的情况及其相互的关系，另一方面，万一被捕后，改名换姓，可以应付敌人盘查拷问，以隐藏自己。

在“马日事变”之后，在土地坡老家住过半年，白色恐怖，笼罩益阳，革命处于低潮，他当然不好出头露面，我们兄弟每天在后山菜里从事劳动。因为我们的父辈们那时都是从事田园生产劳动的，我们从小也养成了劳动习惯。他的加入共产党，还是有次在后山一边劳动一边告诉我的：是当时赵恒惕出了一张布告，说赤化要不得，赤化很危险。我当时不懂赤化是什么意思，就问他。他说：“赤化就是共产主义，赤化并不危险，如果中国真的赤化了，那中国就得救了……”。我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要为在中国和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从那时起我也懂得了一些革命的大道理，这对我在人生道路上，还没有走入反动的歧途，也是有启迪的。

当时，我们为什么要在后山园地劳动呢？因为在那风声鹤唳的时刻，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在后园劳动，既可畅所欲言，又可在风吹草动之际，往后山隐蔽，逃脱敌人的魔掌。

那时，他不能公开从事革命活动，于是我间几天就到街上来打听消息，回去告诉他。有一次，大约是1927年五月下旬某日我来街上想去看农协的主要干部曹曙初，他和海云是在巖言的同学。我上街之日，先是许克祥派了陈光中带了军队到了益阳，来时没有声张，大家都不知道，第二天早晨，陈光中把军队分为两部，一部分去三堡（现在的新式堤）包围工会，另一部分去五马坊包围农会，那一天我去看曹曙初，走到万寿宫那里，只见陈光中的军队从后面跑步来了，我只好让开，我并不知军队去干什么，我仍然慢慢向农会走去，走到

南门口，才听说农会被军队砸烂了，我就只好上来。第二天，陈光中的军队开往桃江去了。农协会恢复工作，第三天我又去农会看曹曙初。我一上楼，只见有四个赤卫队员守了曹曙初。曹见了我就问：“你老弟回吗？”我答：“回啦！”曹又说：“你将我的事情告诉他。”那时我和他说话，都不感到什么紧张，我等了几天才回乡，这时曹曙初已经被枪决了，一说是余璜的命令，一说是袁铸成的命令，搞不清。曹之被枪决，没有出什么罪状。后来听说是他在陈光中军队砸农会时，他爬墙逃跑了，犯了纪律。我赶快回去将这个信息告诉海云，他当时就说，不该打死，就是他犯了什么错误，也不能打死嘛！粉碎“四人帮”后曹的亲属要求平反，县农运调查组的同志到了北京问了海云，他还是表态，要作烈士对待，不知下文如何。

他在益阳长沙不便公开工作了，1928年初，去武汉，在武汉找革命同志联系时，不幸被伪武汉卫戍司令部逮捕，当即从他身上搜出一些商业往来的凭证，敌人以为他真是商人。令其交保开释出狱。后来敌人又生了疑心，限令“益阳纸业公会”（是益阳纸商驻汉口的组织）交出海云到案，我得知这一消息，我想这个问题，如果扩大到益阳来，一经查出海云的真实政治面貌，那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我毅然贩了一点土纸作为行商，赶到新堤出售，并改名李海楼充当海云出狱的担保而投案。被关押于伪武汉卫戍司令部两个月。后来我用重金买通其军法官，以随传随到的办法出狱了。

我出狱以后，思想认识有了提高，我看一些革命者，真是“身无半文，心忧天下”，于是我对海云常说，你们在经济上如有困难，尽可向我说明，我以前也曾对他说过：在经济上扶危济困是可以，交朋结友次之，滋补身体又次之。我和他在经济上有这个共同的认识后，通过他的关系和书信介绍，我曾支援叶紫（又名余鹤林益阳人共产党员、

进步文学家）银洋十元。后来我又得知共产党员李起元（益阳新桥河人又名李鐸）。在北京和谭平山、邓演达组织什么会，李有困难，我就付了十五元银洋给他。礼轻意重，也可说明我们兄弟之间的意气相通。

他出狱以后，仍在汉口与新堤一带从事地下工作，这时他与党组织接上了头，一个叫卜息园的同志指示，如果两天不见他的信，就说明发生了事故，要赶快离开，有一次卜三天没有来信，他知道已经发生事故了，准备马上离开，可是由武昌到上海，座轮船，无旅费，正在发愁，不知怎么办。恰巧这时有一个沙头反茧厂“永裕祥”（先设在新堤，后设在武昌）的职工由汉口到武昌来看海云。海云非常紧张，并对那职工说，想赶快离开武汉，又没有钱，那位职工一听，没有表示态度就走了，这时海云当然更焦急，可是一点钟以后，那位职工来了，并送上十元银洋给他。于是他马上离开武汉到上海去了，从这以后他又走了更加广阔和艰巨的革命道路。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回忆冯玉祥将军在益阳的一次抗日演说

奚 范 彰

今年是冯玉祥将军诞辰一百周年。为了纪念这位爱国的抗日反蒋名将，报刊上登载了关于他生前的一些轶事，也勾起了我对冯将军的回忆与怀念之情，想起了少年时代耳闻目睹的一件难忘的往事——他在益阳的一次抗日演说。

那是一九三八年秋天。冯将军来到了湖南省益阳县城。因为民心要抗日，老百姓争相传诵冯玉祥到来的消息。大街小巷贴满了欢迎的红绿标语。记得是一个骄阳暖照的大晴天，全县各界齐集老城西面鲁肃堤边的公共体育场开欢迎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各公法团体，机关学校，城乡居民好几万人。那时我是个学生，也随学校队伍参加了这次大会。

开会的那天可说得是盛况空前。会场里人头攒动，都渴望一睹这位力主抗日的将军的风采为幸事。人们原以为冯玉祥是当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来时一定是高头大马，随从如云。谁知首先入场的是每人背着一长条木凳的百来个士兵，这支背木凳的小队伍走完后，一个兵肩上扛着棵小树过来了，跟在后面的是当地的一群穿长大褂和中山装的知名人士，他们簇拥着一个士兵模样的人入场了。到会的人们纷纷议论开了：这就是冯玉祥啊？他的朴素、正直、潇洒的风度使人赞叹不已。

欢迎大会开始了。主持大会的人说了一通民众听不清也听不懂的念词。接着请冯玉祥将军演说。这时，几万双眼睛都注视着前方主席

主席台的正中。冯玉祥将军魁梧的身材，紫酱色的面庞，乌黑的头发，炯炯有神的眼睛，脚穿青色布鞋，身着一套洗晒得发白了的草绿色军装，神采奕奕地向群众挥手。我们学生队伍离主席台较近，看得很清，这形象至今记忆犹新。那些背长凳的士兵，把长凳放在靠近主席台的前面，这时我才然大悟，这些木凳的用场，原来是让婆婆老老坐的。

冯玉祥将军演说的时间并不长，说得通俗易懂，他援用《世说新语·言语》孔融被收后他的两个儿子说的：“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的典故。冯将军摒弃了原义，把这个成语活用为整体复灭，个体自然不能幸存的这个新的比喻义，深入浅出地阐明了抗日救国的大道理。我记得当时他左手握住士兵扛来的那棵小树，右手托着一个草编的鸟窝，把鸟窝安放在树枝交叉处，再从鸟窝里掏出几只鸡蛋来，慷慨激昂地大声疾呼，他把树比作国，把窝比作家，把蛋比作生命，把握住树的手比作捍卫国家的人，他号召人人动手来捍卫我们的国家，他严肃地说，先有国然后才有家，才有生命，他用他的大手紧握住的那棵树比喻说，这就是我们的国，我们的国遭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都要用双手来保卫它，那就是起来抗日，如果不抗日，这时他把手一松，树倒了，窝摔了，蛋砸了。他就是这样用通俗的语言，形象的比喻，来说明抽象的道理，使民众懂得了不抗日就会遭致亡国、亡家、亡命的后果。冯玉祥将军演说完毕，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抗日口号此起彼伏，从这以后，益阳民众的抗日热潮与日高涨了，我记得我们学生还沿家沿户收破铜烂铁支援兵工，参加孩子剧团作抗日宣传，以及“七七献金”等。

事情过去四十四年了，冯玉祥将军当时演说的风度，现在还浮在我的脑海里。冯将军生前替人民办了好事，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在他诞生一百周年之际，我写了这段回忆，聊申怀念之情。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四日